

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付桂芳

摘要: 大规模农民工城市化进程中,不仅涉及制度政策与社会管理问题,更涉及心理融合与心态变迁问题。本文在社会心态的内涵与核心维度基础上,从社会建构主义、不确定性规避和人本主义心理角度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认知、社会公平感、社会信任感和社会认同感以及自我效能感与其社会心态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并指出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重视、为其提供心理服务、促进其与当地居民的心理融合是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社会心态培育的重要途径。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社会建构主义、不确定性规避、人本主义心理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490X(2013)6-243-03

作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博士;广东,广州,510420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GD12CGL03)

国务院在2010年1月发布的《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首次使用“新生代农民工”的说法,同时强调“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让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新生代农民工主要是在80和90年代后出生的,在我国2.6亿农民工中,新生代农民工约1.5亿人。如此大规模的农民工如何融入城市、实现身份转换,不仅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建设,更需要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心理和谐。本文从社会建构主义、不确定性规避理论和人本主义心理角度探析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以期从心理层面促进农民工市民化。

一 社会心态内涵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特点

社会心态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文化影响下形成的社会或社会群体成员表现出的普遍的、一致的心理特点和行为模式,是宏观的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的总和^[1]。社会心态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心理现象,是人们基于对社会现实生活的各种感受而形成的某种情绪状态,它可以是长期或者短暂的,其主要特点是共享现实性、群体性、时代性和弥散性,某些具体的社会情绪事件作为导火索使人们的某种社会心态衍生出某种具体社会行为。社会心态的核心维度包括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社会认同感、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和社会情绪。

第一代农民工暂住城市,以谋生为目标、将回归农村,适

应问题不突出,社会心态也较好。第二代农民工有一部分是留守儿童,从小缺乏完整的家庭教育,抗挫能力不强,有一部分是出生在城市,但又是农村户口而未被城市人接受的“农村人”^[2]。新生代农民工基本没有务农经历,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物质和精神生活要求高,职业期望高,对城市有较高认同感。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参与城市种种公共活动,体现自身价值,希望在城市定居,但由于户籍制度等限制,他们又是城市中的边缘人,所以他们的社会心态是比较复杂的。

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总体是积极的,但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存在社会剥离感、身份认同危机、生活不满意和不良社会情绪等问题(刘启营,2012;许传新,2007)^{[3][4]}。笔者所做的广东省农民工社会情绪现状调查也发现,60-70%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情绪是愉快的、满意的,但也存在一些诸如不满、悲伤等消极情绪。王俊秀、杨宜音(2013)在社会心态蓝皮书中指出,民众社会情绪总体基调是积极的,但负向情绪的引爆点低,存在的一些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社会和谐的负向情绪基调不容乐观;进城农民工普遍感到社会不公平,遇到社会不公平,他们主要采取消极逃避的行为;而新生代农民工自尊水平偏低^[5]。近年来,在广东省等地发生的农民工与当地人群体冲突、农民工讨薪和跳楼等事件,都暴露出新生代农民工的不良社会情绪、心理健康以及社会管理存在薄弱环节等深层次问题。

二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孙红永(2012)等认为社会阶层低下、缺乏正常家庭和社会交往、身份认同危机、教育程度低、社会管理和保障机制不健全、经济收入低等是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不良心态和社会情绪的主要因素^[6]。本文从个体自身、外部环境以及二者相互作用的角度考察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如图1。个体自身因素包括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来源地、个性特点、继续教育程度、身心健康状况等;外部因素主要包括工作类型、收入、政策制度、人际关系、社会支持、居住环境、子女入学状况等;自身与环境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因素主要是自我效能感、社会情绪、社会认同感、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等。

(一) 社会建构主义基础上形成的社会认知

社会心态是在社会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环境因素,强调人们的社会认知必须与活动的情境系统的限制条件相协调,即知识的学习、认知发展与情境的规律性相一致。社会建构主义是在大脑内部的认知建构的基础上来揭示外部社会互动的作用。在社会环境和文化的背景中,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知活动与社会环境、文化情境的交互作用导致他们社会认知和观念的建构。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

认知和价值观有其社会性、环境性和个别性。

第一,社会环境是社会心态形成的客观背景和宏观基础。由图1可以看到,新生代农民工身处现实的社会环境中,而客观的社会环境对人们的社会认知有重要影响。社会环境是人们所处的社会政治环境、经济环境、法制环境、科技环境、文化环境、语言环境、卫生环境等宏观因素。可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上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上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公民个人层面上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正是良好社会环境的建设目标。在这种社会环境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会产生积极心理感受,进而形成良好社会心态。

第二,共享现实性。社会心态是社会成员共享的心理现实性,不同于物理的客观现实性。共享的现实性是根据人们与他人体验到的世界内在状态的共同性的动机而形成的^[7]。这也是社会建构主义强调的主体认识客体的能动性,强调人在和他人的相互作用之中、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之中建构自己的社会认知与知识,即知识和理解是认知主体在客观环境的基础上建构的。因而,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是在共享现实性的基础上的环境化的认知、互动、发展和关系中形成的。在建构的社会认知基础上,农民工形成了相应的社会信任感、社会公平感、自我效能感和社会认同感。

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的认识和建构客观社会环境是社会心态形成的重要环节。比如,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机会,在配置资源方面、提供机遇方面、给予服务方面、分享成果方面做到公平公正,但这些制度必须具备公开性,政务公开、公开政情是服务型政府有效履行公共服务职能的重要保障^[8]。因为只有信息公开、乃至媒体的宣传才能更多的让农民工感受到、体验到社会现实环境的正面作用,对他们的心理产生积极影响。因而要在弘扬主流社会价值观、引导合理社会期待、鼓励公民社会参与、加强社会支持系统方面培育新生代农民工的良好社会心态。

(二)需求满足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信任感与社会公平感

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认为,人们心理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对周围世界形成基本的信任感,新生儿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基本的生理需要得到很好满足,他就会获得安全感,进而形成对这个世界的信任心理,形成良好的人格特征。同理,新生代农民工的各种基本需求是否能够得到满足决定着其社会信任感的形成。根据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类需求可分为五个层次,他们由低到高依次即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归属的需求、自尊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现行的关于农民工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能否满足他们衣食住行性的基本生理需求,以及能否满足他们在安全、爱与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等方面的需求,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安全感、信任感。同时,新生代农民工在需要能否满足基础上的横向社会比较又决定了他们的社会公平感。

显然,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现行的关于农民工的政策法规很难保障他们上述五个方面的需求,尤其是爱与归属、自尊和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新生代农民工的归属感、生活满意度、社会公平感和社会信任感。新生代农民工的维权意识很强,注重权衡所处社会环境中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制度能否满足他们的各方面需求,如果农民工长期处于与外界环境不平衡、不和谐状态,就会导致他们的

社会不信任感和社会不公平感,进而导致他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和对社会的不良社会情绪和消极社会心态,见图1。

(三)不确定性规避情境下形成的自我效能感

不确定性规避理论认为无论是个体还是群体对自己的未来都有一种紧张和焦虑,因为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了减少这种心理上的不安,人们会不停地努力发展科技、法律和宗教。发展科技是为了规避大自然给人类带来的不确定性,发展法律制度是为了规避他人给自己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发展宗教则是为了规避自身精神信仰给自己带来的不确定性。而对新生代农民工而言,他们就是不停地努力地协调自身和自身、与外界的心理平衡,形成积极的自我效能感,以规避生活中的各种不确定性。自我效能感指的是个体对自己能否成功完成某一任务的主观推测与判断。

新生代农民工根在农村,身在城市,面临着更多、更大的不确定性。宏观来说,在现实中他们身份不确定、归属不确定;微观来说,他们工作不确定、住所不确定;那么他们的未来将发生的不可知就更大。农民工需要规避现实和未来的不确定性给自己带来的极大风险,他们必须付出比城里人更多的努力,一方面他们要相信自己,对自己成功适应城市生活有信心;另一方面他们不断地努力发展自身,使自己在城市生活中更加具有竞争力,这样他们才能达到和保持自我内心的平衡。

新生代农民工很注重自己内心的情绪感受、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取向是否和谐,是否有内心的安静和平衡,并通过自我效能感表现出来。如果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是心理平衡的,则会表现出来高的自我效能感,相信自己有能力应对生活和工作中的即将发生的各种不确定性事件,表现出自信。相反,如果他们内心处于不平衡状态,处于矛盾和纠结状态,他们会表现出来较低自我效能感,不信任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应对将来发生的事情,表现出自卑。如何才能让新生代农民工有较高的自我效能感,关键就是要让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中体验到成功,成功是自信的积累,自信又是再次成功的基础。可见,在农民工城在职业上和生活中体验到成功,是他们形成良好社会心态的基本保障。

(四)情绪事件导致的社会情绪与社会心理状态的表达

Seger等认为,区别于个体水平的情绪,社会认同一定程度上影响群体情绪。如图1所示,新生代农民工对所居住地区和整个社会的认同感直接影响他们的社会心态。同一个群体的不同成员倾向有类似的情绪,群体情绪可以预测群体态度与行为倾向,如想要攻击对抗的其他群体,这种倾向会超越个人情绪的力量^[9]。Smith等研究发现社会情绪,如同情、困窘、内疚、羞愧等,是对他人的社会心理状态的代替表达,如,你感到困窘,是你相信他人会认为你的行为是愚蠢的。Mackie等认为群体情绪是在社会分类的过程中人们对某些情境和情绪事件的反应而引起的,当事人认为这些事件或情境影响到了他们的群体利益。Lamm等人认为社会情绪的产生不仅和自我有关,更依赖社会情境。他通过fMRI研究发现,大脑的前岛皮层与移情、同情、公平和合作等内在感受紧密相连。当看到他人痛苦的时候(由视觉线索或者抽象符号触发),人们通过行为理解和心理相互作用的多种机制触发同情,进而可能会引发群体事件,如图1。这也是农民工和地人之间群体事件的形成原因,偶发事件、谣言和传言是导火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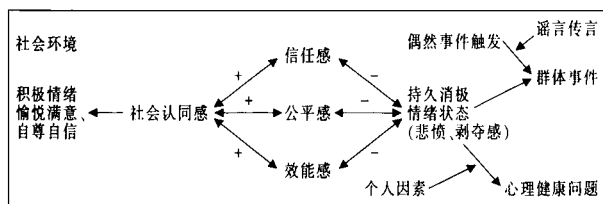


图1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形成机制

(五) 各种感受长期的累积形成最后的社会心态

新生代农民工对自身较低的自我效能感、对社会和他人的不信任感、不公平感偶尔出现或者短期存在,不大可能导致他们的消极社会心态。但如果各种消极感受长期存在(3个月或半年以上),尤其是数年之久,最终的结果是,要么导致指向自身内部的心理健康出现问题,要么导致指向外部的社会攻击行为或者群体事件,如图1。比如,一些农民工的在务工地存在的临时夫妻现象,他们的配偶留在老家,仍存有正常婚姻关系,但由于他们远离家乡,长期的情感空虚和生理需求压抑使他们冲破道德底线,使他们背叛婚姻,建立临时夫妻关系,这就是时间的累积作用。当然,长期的高自我效能感、公平感、信任感和社会认同感也会累积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的积极社会心态。

总之,良好的社会心态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健康心理和对社会的感恩,这样就在他们与社会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和循环。相反,消极的社会心态导致他们个人的不健康心理和对社会的怨恨,这样就在他们与社会之间形成了恶性互动和循环。

三 新生代农民工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途径

公民的社会心态状况是社会管理效果的一个衡量指标,是社会管理的晴雨表。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公民最大的青年群体之一,他们的社会心态更加不容忽视。因而通过硬件和软件建设增强新生代农民工的积极社会心态迫在眉睫。

(一) 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重视

各界都有待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的重视。如,学界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的研究尚不多见,这也体现了研究者和实践者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心态尚未给与足够重视。对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一方面是政府在政策制度上加大对农民工的支持力度,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教育机会,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完善进城配套政策和社会管理制度等已成为有关政府部门思考的重要课题。另一方面更加需要在精神心理方面给予农民工大力支持,使他们成为当地的主人,有归属感,形成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黄相怀(2013)指出当前社会心态在价值观念、社会感受、社会心理方面存在不断分化并呈现多样性。因而在弘扬主流社会价值观、引导合理社会期待、鼓励公民社会参与、加强社会支持系统方面培育良好的社会心态。孙红永(2012)从提高政治地位,加强人文关怀和提高工资待遇角度提出了化解新生代农民工怨恨感的对策^[10]。共青团中央维护青少年权益部维权工作处课题组研究指出,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加强心理辅导、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要求、加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是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质量的重要途径。

(二)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心理服务

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心理服务,能够改善外来人员的社会心态和心理健康水平,提升其归属感和融洽度,有利于促进新老融合与社会和谐稳定。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服务主要是在政府、企业、社区层面开展。政府成立农民工情感护理中心,提供情感关怀和各方面的心理服务,具体形式包括服务热线、个体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团体心理辅导与培训等;农民工所在的企业开展EAP服务,为他们提供情绪管理、压力应对、职业生涯规划等心理辅导。社区成立心理服务站,为农民工解决个人、家庭和工作方面遇到的心理问题,并进行相应的心理培训。心理培训主要是培育农民工的积极心理品质,强调个人的责任感、利他、文明、忍耐和职业伦理,包括培育积极社会情绪体验和积极人格,积极情绪体验包括对过去的幸福感和满意感、对现在的愉悦感、对未来富有建设性的认知等,如感恩、希望、忠诚等体验;积极人格指的是正直、节制、智慧、勇气、人性与超越等。

(三) 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与当地居民的心理融合

对于提升农民工的归属感和积极社会心态的培育,促进其尽快融入城市,多数学者寄希望于加强物质保障和制度建设,但事实表明,农民工的社会管理复杂多样,单靠制度建设推进新老居民融合,将旷日持久。因此,我们必须跳出这种思维定势,更加关注社会软环境建设,从精神层面关注农民工和当代居民的心理融合,让新老居民有机会深入交流、互相理解、互相接纳和认同、互相尊重,这才是促进农民工城市化、达到新老融合的根本出路。

大规模农民工城市化是我国社会转型期出现的特有社会现象,西方国家因不设户籍,因而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很少遇到大规模农民融入城市生活过程中的心态变迁问题,所以相应研究不多,只有少量关于移民社会情绪、社会心态的研究,国外研究者关于群体情绪的研究可为农民工社会心态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过程中的社会心态的形成和培育尚需根据国情因地制宜。

参考文献:

- [1][5]王俊秀、杨宜音:《社会心态蓝皮书:2012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 [2]刘玉蓉:《论城市外来工聚居社区社会风险生成逻辑》,《求索》2013年第1期。
- [3]刘启营:《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心态及其影响因素》,《当代青年研究》2012年第10期。
- [4]许传新:《新生代农民工城市生活中的社会心态》,《社会心理研究》2007年第1期。
- [6][10]孙红永:《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情绪的危害与对策》,《重庆文理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
- [7]Echterhoff G. (2012) Shared Reality Theory, [G]Lange Pamv, Kruglanskiaw and Higgins Et (Eds.) Handbook of Theories of Social Psychology [M]. Los Angeles: Sage Publications, 180-199.
- [8]凌茹、刘家旺:《公共管理伦理视角下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构建》,《求索》2013年第3期。
- [9]Charles R. Seger, Eliot R. Smith, Diane M. Mackie (2009). Subtle activation of a social categorization triggers group-level emotion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45.

(责任编辑:南桥)